

自序

家在岛国

—

1993年7月2日，告别了祖母、父亲和妹妹，以及新婚的妻子，我登上了新航直飞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的波音客机。时龄28岁的我，怀里揣着一本绛红色封面的护照，随身的挎包里掖着一份为期两年的雇佣合同，心中充满憧憬和忐忑，坐在国际航班的机舱座位上。

飞机平稳升空后，很快地进入自动驾驶的模式。穿戴整洁、笑容可掬的空客服务员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机舱服务。很快地，大多数乘客在喂足灌饱之后，渐渐进入了梦乡。飞机在中国海上空的万米夜空翱翔。

我的座位紧挨着过道。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一位中年男子，他不停地啜饮着从漂亮的空服员小姐手里递过来的罐装虎牌啤

酒。因为这一天是星期五，我估摸着他是到中国公干后返程回家的新加坡人。当他知道我是去新加坡的船厂工作之后，双眼看了一下年轻的我，意味深长地关照道：千万小心，安全第一。

换上土黄色工装的我，系上绿色的安全带，脚蹬长统靴，头戴安全帽，连同新来的一组年轻的工程师，被分配到船厂各个部门进行实习。我的“师傅”是一位名字叫“丁”的马来族修船经理。这便是我在赤道气候下的体能耐力训练的开始。

十万吨级的超级巨轮停靠在修船码头，露出堤岸的船体有如一幢七、八层高的楼房。攀上数十米高的回转铁梯，越过跳板，一待双脚踏上被日头烤晒得滚滚发烫、冒着热气的甲板，我的全身已经被汗水湿透，而我们的目的地是并立停泊的离岸最外端的第三首油轮。当终于跨过两条巨轮，迈步走到第三首轮船的悬梯时，我身上的汗渍已被阳光蒸发，原先汗湿的衣裤又被海风吹干了。

丁，个子矮小，皮肤黝黑，说起话来，十分友善。当然，我们是用英语交谈的。他让我注意观察他在船上的一言一行，叮嘱我如果遇到洋人船东代表问话，就说自己是见习生；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不要随口答应对方的任何要求。他并千万关照，要注意人身安全，抬手落脚之处，都须一百分地用心。我以前与大学好友假期同游，曾经在黄山鲤鱼背上历经过诚惶诚恐的情景，比起现在在修船现场的处处惊心，两处场景都令人想起那条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的古训。

短短数月的见习阶段很快就结束了，我从丁那里学到了很多，包括用简单的马来话寒暄。过后，我被分配到船厂的电器及设备应用与维修部门。工作作息时间使然，我们一班同事每

天披星戴月出门，晚上加班后回到住处，已是黑夜笼罩街道，巴刹和熟食中心人头攒动的时辰了。

我心里不时惦记着千里之外的亲人。那时，电子邮件还不普及，新电信的国际直拨电话卡是最解相思的工具，却也是最烧钱的奢侈品，于是我便与心上人开始了一段古人常说的“鱼雁传书”。

中秋节前夕的某夜，我留在船厂通宵赶工，夜空中明亮如玉盘的满月，慷慨地散发着赤道边皎洁无瑕的月光，温暖着一颗因思念而生孤独的心。天亮后回到住处休息，望着窗外的翠绿，我在从家乡带来的方格子稿纸上，写下了一篇名为《家书》的散文，然后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，寄去报社。周末休息时，我在报纸上读到了自己的这篇短文。

二

不到半年，妻就来到我的身边。我搬出了与乘坐同一架班机前来新加坡就业的同事同住的居所，在附近的组屋区人家租了一间房，一个衣橱一张双人床一个小方桌，开始了我们小俩口的新生活。

聪慧勤劳的妻很快找到工作，成为一名“白领”上班族。不久，我们双双拿到“蓝登记”，成了新加坡永久居民。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组屋，尽管是从转手市场上买下的已经有二十多年房龄的旧屋子，但却是我俩共同营造的家。我们双双报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部分时间课程。光阴似箭，时光老人对我俩也颇为袒待，就在我们念完书后不久，妻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。

当时，我已经离开船厂，正要前往美国加州，去位于硅谷的一间公司接受在职培训。望着妻逐渐隆起的肚子，看到她强烈的妊娠期反应，我犹豫了。不巧的是，在素来天清气朗的新加坡，那年气候干燥季节正好碰上邻国在大规模烧芭垦荒，处在烟火的下风口，整个岛国被烟霾给吞没了。我们嘀咕着是否乘机干脆二加一地全家一起转移到美丽的加州，何况妻的胞妹已经在那里安居乐业了。

妻终究没有来加州见我。在美国过完平生第一个感恩节，我回到了我们在岛国的家。很快，我们正式地迎来了家庭的第三位成员，属虎的长子。新工作和新生命给我的生活制造了无数兴奋点。在岛国灿烂阳光下，我们的虎儿健康地成长。经历了沙士（SARS）风暴后不久，我们又幸福地迎接了第四位家庭成员、属鸡的次子的到来。在几年以前，我和妻先后将我们原来绛红色封面的中国护照，换成了有着鲜红色封面的新加坡共和国护照。儿子们一出生也自然成了新加坡公民。

2009年，岛国的经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。那年，在凄凉一片的经济萧条声中，我也为岛国的统计数表增添了一员中年失业人口。

次年5月，我参加了在本地西部一家企业的会议室里举行的一场工作面试会。这是一次特地安排的面试，面试小组成员包括某跨国公司的亚太区域领导，以及该区各国工厂的当地负责人员。面试结束后，一位来自泰国工厂的负责人向我伸出手臂，热情地握住我的手，他从我的履历注意到次日就是我的生日，于是预祝我生日快乐。

不久，我就前往在中国的新中苏州工业园，开始了我在这家德国企业为期一年的项目管理工作。

三

在我当初前来新加坡第二年的1994年，新加坡同中国两国政府之间的第一个国家级的工业园区合作项目——苏州工业园开始正式启动。2009年，为庆祝苏州工业园成立十五周年，在俗称“榴槤壳”的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，一连三晚，连续上演全本白先勇青春版昆剧《牡丹亭》。妻和我在“榴槤壳”里，共度了三个精采纷呈的夜晚。

当我前往在园区内的那家德国公司报到时，苏州工业园已经是处在中方称之为“第二次创业”的转型时期。从初期的合作双方磨合，到中期的股权转让，新中双方在工业园区具体管理的行事风格上各自都有了明显的调整。在此环境下，离家独身一人在此工作的我所面临的考验，更多的是来自于个人及人性方面的挑战。

离开母国十多年后，重新回到一个自己度过童真少年和青涩岁月的土地，除了无数的感慨之外，却也发现了不少“文化震荡”。对于一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来说，昨日充满了太多天真的理想，而今日又有太多“回不去”的无奈。

好在工业园旁不远，还有一个“古文化”的苏州，多少还可以用来作个人心智上的探索和情感方面的滋润与疗伤。可是即使这样的日子也良辰无多，在公司的项目眼看就要结束的时候，北方的姊妹公司为我的就业打开另一扇窗。于是，在一个寒冷的冬日，我离开了江南，乘机飞到了北方的天津。

说来也是奇怪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上海修读研究生课程时，曾经来过天津做产品试制。当时还在本科读书的女友，亦即现在的妻，在暑假里从南方坐火车来到天津陪我。这是我们恋爱阶段第一次到外地拍拖。

从江南乍到天津，北方的寒冬给了我这个“赤道边缘人”一个实实在在的下马威。蜷曲在“如家”暂住的小屋里，躲避着屋外的寒风与降雪，我在反省自己北上决定的对错。然而，工作不等人，负责公司供应链管理的我，旋即投入到去外地访问供应商和潜在业务伙伴的繁忙工作中。

这一次，与同事前往位于长江旁边的一个三线城市Z市，拜访公司的一个主要供应商。出面招待我们一行的是从对方总公司空降到Z市不久的一位少壮派A总。在面对湖光山色的酒店餐馆的包房里，一席人洗耳恭听眉飞色舞的A总讲述他的个人奋斗史，听他如何从底层迅速窜上目前的高位，看他如何白道黑道通吃玩转整个Z市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“平易近人”的A总技巧性地支开了手下的一班随从，亲自驾车要带我们三位客人去玩“超刺激的”。而与之初次见面的我，却对这位A总的超热情款待感到极不自然。事后回想起这段经历时，我在想，不知道这位A总当时是在存心试探我，还是无意中忽略了我。

北方的冬天加上当下所处社会环境的浑浊，一下子就把我推到了思虑的边缘。即便面对从德国来访的公司总部同僚和新加坡籍的同事，对饮着廉价的啤酒，聆听着他人的故事，也解不开我自己的心结。偶尔，周末漫步到离住地不远处的球场，看大学时代的老同学踢足球，有时也穿过整个市区，应邀前往老同学家小坐，而这一切却徒增我对在新加坡妻儿的思念。

2011年7月2日，我从北京国际机场离境，乘坐新航班机重新回到了自己在岛国的家。在撰写此篇序文时，我特意翻阅了一下已经作废了的旧护照签证内页上的出入境盖章，赫然发现

这一天正好与当初首次前来新加坡是同一日期。对这时间上的巧合，我读出这样的意义：18年前的这一天，我是离开家乡、故土、亲人，前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；18年后的这一天，我是踏上回家的旅程，回返我自己选择的家国。

四

早在1993年准备来新加坡之际，我从上海的一份大报上，读到了广州一位作家撰写的名为《新加坡河》的长篇散文，这让我对这座即将在我人生旅途中留下重要篇幅的城市国家，有了一点人文上的想象和思索。

1980年代，还在求学时期的我，就知道了作为“四小龙”之一的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奇迹，也熟悉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名字；在那段时间，我从报章上读到了大量有关新儒学的文章，了解到了余英时、杜维明等人对东亚文明以及新儒家思想的鼓吹；也是在那段时间，我从电视里看到听到了来自新加坡、台湾、香港等地的大专学生，他们用带着各自风味的汉语、各自风格的思辨与素养，交流各自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——也是在方寸的电视屏幕上，我单向认识了留着中度长发、蓄着胡髭、讲评丝丝入扣、话语谆谆教诲的，时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的领军人物郭振羽教授，他是当时的东亚大专辩论会评委之一。

由平时阅读所及，我也知晓了有关郁达夫因情变而南下港岛、继而前往新加坡主持报章副刊、最终被日本皇军在苏门答腊杀害的传奇故事。所有这些，笼统地构成了我对旧“南洋”之新加坡的印象。

待我来到新加坡工作、生活、兼职读书后，文学上想象的“南洋”新加坡开始与自己渐行渐远，现实中的狮城岛国却是像独特的南洋水果榴梿一样，奇特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令人玩味的是，当代新加坡形象也与有着水果之王之誉的榴梿存有几分神似：表壳坚实、密不透风，还带有冷漠、具有自我防卫机能的尖刺，里面却是风情万种、酥软浓郁，让人一爱上就不由自主地垂涎欲滴，流连忘返。

工作和学习马上将妻和我带入了一个英文世界。即使在我最早就职的船厂，尽管高中低各层都主要由华人任职，日常的行政用语还是英语。平日里即使上超市，人们也是通常将英语挂在嘴边，连会听说华语的华人也不例外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因为“爱你在心口难开”。例外的，是在巴刹或熟食中心，在那里你可以放心地使用华语，而且还能学到不少带着表达方式别致、传神到位的方言用词，或者是掺杂了马来文或英文词汇的新加坡土话。

如此的语言天堂，几乎让我这个喜欢学习各种不同语言的人迷失了方向。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，由于太久没有接触汉字中文，当我在工余，坐在写字桌旁，想把自己复杂而零乱的感受融合凝结成方格字时，却突然卡住了，心里念叨的那个汉字，怎么也不能从手指握住的笔端写出。

新加坡曾经被人冠之为“文化沙漠”。我想作这判语的人，如果不是抱有某种偏见，就是没有诚心诚意地走入岛国在地的生活。也许，在殖民地时代，颓废的黄色文化曾经像在马来亚一带泛滥的鸦片毒品一样，侵害和愚昧大众的思想，而在五四新文化乘着东北方向的贸易信风刮来以后，这在天朝中央之国眼里处于南天一隅的化外之域，也渐渐形成了具有马来亚独特风格的在地文化。50年前星马分家之后，岛国文化继续顽

强生长，虽然本地华族文化的环境并非风调雨顺，然而发展到今天，新加坡的华族文艺已具备了自身独特的风味。

五

在岛国的家生活二十多年，我心里一直很感激那些因各种机缘结识的各路人士，而其中以因“文化”而结缘的尤甚。

还记得20年前，我们认识了一位陈先生，他是受英文教育的人士，当时身居某上市公司要职。他是因学汉语而与我们相识的。一次，他送我们两张根据法国大文豪雨果原著改编的同名西洋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的戏票。那双占据极佳观赏座位的对票，票价不菲，对于一对刚来新加坡工作不久的年轻夫妇来说，是极其珍贵的。通过观赏演绎铺展的音乐剧情节，感受剧中人物命运发展的推动张力，我的心再一次被人类强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深深震撼。人道主义的关怀是没有语言文字上的鸿沟的。

的确，岛国新加坡是以英文立国的一个亲商城邦，这是不用争辩也无须否认的事实。但是在民间、在广大长期被压制在正规历史书写之外的老一辈华族社群里，那股存在于古老中华文化里自强不息的伟大生命力，即使在南洋大学已经完全消失了整整一代人的岁月之今日，也让每一个向往华族文化的人，感到怦然心跳，以致热血沸腾。

当身在岛国的我，读到梁文福在于创作《新加坡派》同一时期的1990年谱写的歌词《情商》时，我再一次确认：文化是远远大于政治的。个人作为一个族群的个体，对母族文化的爱与生俱来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；任何试图让民众忘却、甚

或抹杀自己文化的举动，不论经过如何冠冕堂皇的粉饰，都是对历史的篡改。

六

自从五年前回到了岛国的家，我便如饥似渴地拥抱长期与之若即若离的岛国华族文化。角度的不同，换来了完全不同的景观。我吸纳、消化、反刍着，在不知不觉中，近几年我已在本地图报杂志上发表了十万字左右的文章。

偶然一次闲谈，朋友建议我将报章上发表过的文章积集成册，我并不为意。一转眼，我将迎来自己“知天命”的50岁生日，正巧的是，我安家的岛国也在迎接独立50周年的喜庆。在汉语词汇中，国家与家国互为补充，情理相连。于是乎，我决定将过去20多年来自己在新加坡发表过的文章中选出50篇来，集成一本《半百集》以作纪念，与岛国同庆。

我的刍议得到了热心科教文化出版事业的潘国驹教授的大力支持。感谢新加坡文化前辈谢声远、刘培芳等人，在百忙之中抽空对这个序言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。也感谢李氏基金和国家艺术理事会对出版费用的赞助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家里的妻儿，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家，也就没有现在的我，更没有这本纪念文集。

在欢庆新加坡共和国建国50周年的日子里，也迎来自己50岁生日的我，要对我选择的家园说，因为你内在的文化和历史，我更愿意与你共同走向未来。

我的家，在岛国。

50@SG. home@sg.

2015年3月15日